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韬与晚清革命

[美]柯文 著 雷颐 罗检秋 译
刘东 主编

在中西猛烈碰撞、
新旧激烈冲突的近代
中国，王韬是一位沟通
中西、承旧启新的独特
人物。通过对王韬的透
视，作者展现、剖析了
晚清思潮、政局与社会
的变迁，并提出了近代
中国的“沿海”与“内
地”这一极具现实启发
性的问题。

江苏人民出版社

K207.8-51/K254
Z800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策划 周文彬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韬与晚清革命

[美] 柯文 著 雷颐 罗检秋 译
本书责任编辑 刘东

书 名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编 著 者 【美】柯文
译 者 雷 颐 罗检秋
责任编辑 王 楠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江浦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页 2
印 数 6041—7040 册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271—5/G·316
定 价 12.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

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第一篇 一个新人的诞生

序 曲 5

第一章 早年在江苏 10

第二章 暧昧的造反:王韬与太平军 33

第三章 流亡岁月:香港与欧洲 56

第二篇 新的世界图景

序 曲 81

第四章 当代世界中的德与力 85

第五章 历史创造中的天与人 103

第三篇 为新中国开的药方

序 曲	131
第六章 教育改革	141
第七章 经济改革	167
第八章 政治改革	191

第四篇 中国近代史上的沿海与内地

序 曲	215
第九章 早期改革者与沿海	220

译后记	255
-----	-----

中文版序言

我的王韬传要出中文版了,这使我深感荣幸。然而,此书原文的出版毕竟距今已有近 20 年了,而书籍并非美酒,不一定愈陈愈醇。所以我觉得眼下重提此书时,有必要作某些分辩。

使这样做显得合乎情理的原因之一,与这部专著(共九章)的前八章所探讨的对象——王韬本人有关。王韬是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作为 19 世纪后几十年的改革推动者,以及作为两种文明间的调停者,他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现在虽然已有一部出色的中文王韬传记印行于世^①,但该书作者却未能接触到我所查阅过的某些英文材料以及未刊的中文史料。由于这些史料对了解王韬生平中许多为人们争论不休的重要方面——他去世的日期、他皈依基督教的实质、他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大有裨益,故此这些信息对中国读者似乎更有用处。

除此之外,在原书的最后一章,我力图探讨一些更为广泛的问题,它们关系到 19~20 世纪在中国发生的变化。虽说倘若今天重写此章,我会在结构上作部分调整,但这些问题本身对我来说却与 20 年前同样重要。的确,可以雄辩地说,随着“文革”的结束,作为毛泽东之后四个现代化的领导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对外来影响已

① 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日渐开放，遂使这些问题比以前更加凸显出来了。

我先概述一下本书末章的主要内容，然后再说明若让我重写此章，我可能会作哪些修正。我所使用的解释框架包括三个前提：第一，广泛的文化变革一般都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开拓者（或革新者）主导，后一阶段由使其合法化者（或生效者）主导；第二，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可被视为两种判然有别且又自成一体的文化环境——沿岸或沿海（香港、上海、天津等）与内陆或内地——之间互动的结果；第三，在 19 世纪及 20 世纪初叶，启动变革的重任主要依赖于沿海亚文化，而内陆则起着使之合法化的作用。在努力阐明沿海地区于晚清作为改革启动者的诸方面之后，我在这结论性的一章中从写个人传记转而写集体传记，探讨了 12 位开拓者的经历，其中 8 人（包括王韬）与沿海文化密切相关，而其余 4 人则是中国内陆的产物。

当初，我便公开承认这一构架“本质上是尝试和探索性的”，并对之作了许多限定。但直到我能使自己与此书保持一定距离以后，我才更清晰地意识到了它的瑕玷所在，以及补救之方。我要说，此书的最大阙失在于它有这么一种倾向——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作为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而且这种倾向贯穿了全书，并非仅见于最后一章。换句话说，我把变革过分地雷同于西方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过分地雷同于上述三个忽视或贬低了内在变化的论断；而制度性变迁的过程，即本书所谓“合法化”，又极易被简化为一种单纯的“中国化”（或反西方化）；最后，我忽略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对变革的阻碍，而几乎只盯住了精神、文化和心理的蔽障。

当然，如果今日重新构思这一章，我仍会保留沿海与内地的两分法，继续坚持将文化变革区分为开拓与使之合法化两阶段的重要性（我指的是广义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不过，我将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中国 19 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内倾性变革，如商业

发展、城市化、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等等,而更要紧的是,我将费点儿笔墨来说明——对这种变革的合法化引起了哪些特殊问题,而这些问题又跟在合法化外来变革时所产生的问题有何不同。例如,冯桂芬提出的改革中国地方政府的深远主张,主要是(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受到了内生的刺激;在把这种主张融入 19 世纪 60~80 年代的中国世界时,其遇到的障碍可以说不亚于王韬之流在努力改革时所面临的障碍。^① 但就王韬的情况而言,由于他的改革方案有那么多都反映了西方的影响,所以其合法化的障碍本质上更多是文化的和社会的,而冯桂芬的障碍则更多是政治和经济的。

更充分地认识晚清的内在变化进程(与最后一章所强调的本土的“被动变革”不同),自然会修正对西方作用的过分渲染;同时,也使这种作用不大容易被说错。例如,重读这本书时,我注意到在若干处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曾把 19 世纪后半叶较为激进的变革形式大都(如果不是统统)归结于“西方的挑战”。除了从目前的观点出发我将尽力避开“挑战”这一术语外(因为它太基于主观的价值偏好),我还要在此指出更基本的一点,即中国所推行的受西方启示的变革(开始是在技术领域,但最终也在许多其他方面),常常被论证为一种防范战略,以阻挠部分或完全源于本土的更为根本——因此也更具威胁性——的变革,而且当改革的提倡者为政府成员或社会精英时,尤其如此。换句话说,与西方有关的变化在特定环境下亦能与中国社会中本质上较为保守的力量联合。所以,并非仅因其受西方启发,就能保证它必然具备更为“激进”、“根

^① 冯桂芬的改革论文于 1860~1861 年写于上海,题为《校邠庐抗议》。由于文章十分激进,所以在他生前从未刊世。他死后其子仅印行了其中一些无关痛痒之作。直到 1885 年,即在這些文章写成四分之一世纪后,才得以全部发表。也只有在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激烈变革时,根据光绪皇帝本人的谕令,这部著作才在中国官员中被广为传播和研究。

本”或“威胁体制的”品格。

最后，也许从我刚才的几点陈述来看多少有些矛盾的是，如果现在重写此书的最后一章，我将不会如此匆忙地否认沿海地区在20世纪后半叶仍是中国革新的主要源泉。自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策倾向的主要特点已经是向外部世界开放，而且其速度之快是在70年代初完成此书时难以想像的。虽不能说近年涌入中国的外来影响全都由沿海输入，但其中绝大部分却是这样；而且就对受外来启发的变革的接受性和容纳性而言，在上海、天津、广州这类沿海贸易集散地与辽阔的中国内陆之间，仍有巨大的反差。

由于同一原因，在毛泽东之后的岁月里，整合与接受由外来专利（尤其是西方专利）所引起的一系列特殊问题，仍然受到一贯的重视。对中国文化独特性和自足性的特有感情，仍是一种需要考虑的力量。

虽说——而且部分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受到了所有外来影响的冲击，深深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水库仍在放水，而且在中国广阔的内陆地区和官僚部门，尤其是在形势危机时水流特别湍急。这种民族中心主义建立起一种不确定的“中国的”标准，外来观念可与之协商，但却不易与之聚合；同样，它还使深受外来观念影响的人在更为广大的中华世界中居于极端边缘和十分脆弱的地位。虽然这些受西方影响的个人的实际观念与一个世纪前的改革开拓者差别极大，但他们所遇到的那些问题，诸如使自己在中国社会合法化，及他们的某些思想倾向合法化，仍使人想起王韬及其同时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最后一部分所探讨的主题无论多么幼稚，却仍可以说它并非只涉及了晚清，还更针对着中国历史的较晚阶段。

柯 文

1992年元月于马萨诸塞，坎布里奇

第一篇 一个新人的诞生

序 曲

1894年早些时候，一个活跃而性急的年轻人，为了给这方土地³上最有实权的官员李鸿章上书宣传改良主张，从华南家乡出发上路。北上途中他在上海逗留，结识了一位颇为著名的主张改良的老者。这位老者帮他修饰上书，使之更易为人接受，又给李鸿章的一位幕僚写了引荐信。这位年轻人便是孙中山，而本书的对象则是这位老者——王韬^①。

王韬的经历预示着孙中山一生的某些重要方面。他的著述可能已对孙中山的某些思想有着直接影响^②。但1894年他们相逢的重要性却只有象征意义。前途无量的孙中山不久就以中国革命家而闻名世界。而王韬却在度过漫长而丰富的一生后，于1897年5月^③，在他同时代的许多中国人都已预料到的巨变前夜，于暗淡中溘然长逝。

① 有关王韬与孙中山会见的所有资料都来源于陈少白口述《兴中会革命史要》，见《辛亥革命》8卷本，上海，1957年版，第1卷，第28页。

② 陈少白口述《兴中会革命史要》，见《辛亥革命》8卷本，上海，1957年版，第1卷，第27页。

③ 一些史料称王韬稍早些时候去世，但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他是1897年去世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预料”变化便是促进变化,使之成为可能。在称之为革命的巨变能够发生之前,必须有一渐变准备阶段。在
4 这一阶段,将有越来越多的人首次认真思考激烈变化的可能性。这便是中国 19 世纪后 60 年所发生的情况。无疑,这一阶段中国人生活的许多基本模式仍一如既往。但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精神方面的不断变化,却堪称为革命性的。

学者对 19 世纪中国的认知往往通过与明治的日本相比较而界定——更诱人的说法是被此限定而难以自拔。从日本“成功”之处出发,把晚清概括为“失败”;19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作为停滞的化身而与“动态”的明治时代并肩而立。这种观点的麻烦之处在于掩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日两国在上一世纪各自与西方相遇时,并无共同的出发点。跨文化比较是一桩扑朔迷离之事,对确认异同虽极有价值,但作为衡量变化的尺度(变化速度)却颇有问题。现代化毕竟不是赛马。即便两种文化碰巧都处于“前现代”状况,也并没有共同的“基线”。

以内在参考点作为衡量 19 世纪中国的变化尺度是更恰当有效的方法。我们只有把 1900 年的中国与 1800~1840 年的中国作一比较,才能理解变化之广。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将 1800~1840 年这一时期称之为“盛清”(High Ch'ing)的最后阶段^①。在 19 世纪前期的中国,从观念和心理上说,英、法、美与中国的距离仍极遥远,这与罗马时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感觉一样。许多中国人(我指受过教育者)从未听说过这些国家。甚至几乎无人有这些国家位于地图何处的粗疏印象。如果中华帝国有任何人略知法国大革命或听说“震动全球的枪声”^②,他肯定是守口如瓶了。这些

① 魏斐德《盛清:1683—1839》,载《近代东亚:论文解释》,J·B·克罗里编,纽约,1970 年版,第 1—27 页。

② 爱默生描绘美国革命爆发的诗句。——译者注

年中,中国与西方的唯一接触点是广州受管制的贸易。但与荷兰⁵在长崎的贸易不同,在广州的接触并未成为西方思想影响的传输渠道。出于自我抉择和完全的自我欣赏而孤立于世的儒教中国,无法得知即将发生的一切。

在19世纪末,经历了四次对外战争、五次国内动乱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强加条约之后,这种骄傲与舒适的世界已被粉碎。但这可能并不是指外在的物质世界而言:可以想像一位来自鸦片战争前的访问者,如果他绕开受西方影响的沿海而专注于中国内陆,可能发现不了多少惊人的变异。阮元在1900年仍可幸存。巨变发生在中国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两三代人之前把中国学人禁锢于儒学天地中的无形栅栏此时首次暴露出来,随后经过许多痛苦的努力之后已被撬开。一种全新的宇宙观,各种信息和价值观念蜂拥而入。应该承认,在1900年确有不少有知识的中国人仍不知道英国的确切位置,犹如某些美国大学毕业生,在东南亚地图前指不出越南的位置一样。而英国与越南一样,却意味着与每人都密切相关之物。但毕竟有许多中国人,粗略地说在1900年有几万人,其世界观经中西交往60年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孙中山不可能生活在1800年的中华世界。

同样,严复、康有为或梁启超也不能生活在那个世界。关键并不在于生活、写作在1800年之后的这些人碰巧受到了西方人的影响,而在于他们处在从根本上说受到西方影响的历史之中。这一环境比其他一切更能把1900年的中国与1800年的中国区别开来。在1800年,中国人认为自身就是世界,认为可以环抱世界。直到1840年这种感觉仍然存在。但到1900年这种感觉则消亡了。在这动荡的过渡年代,一种精神觉醒首先为某些非常重要的事件和并非每一代人都能经历的大规模变化所激发。然后,一两⁶个人便大胆将这种变化描述为“前所未有的”,即从前任何一代均未经历过的。就像尼采笔下的疯人,在即将黎明的黑暗中提灯游

荡,宣称“上帝已死”。开始,这些敏感人物并不能使人们倾听他们的声音,但随着时间流逝,疯人渐多。到1900年,人数已多到能谈论革命性变革而根本不被视为疯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已经发生。对于这个文明的永久合理性,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人未敢稍有怀疑,但它此时却陷于毁灭的边缘。

之所以说孙中山不可能生活于1800年,只是为了说明,在任何给定的一代中所能发生的变化都是有限度的,而这种限度是任何人物——无论多么卓越——都无法超越的。这是历史变迁进程的否定方面。就正面来说,每一代人都为世界贡献了某些新东西,并就此为下一代人改变这种限制提供可能性。根据这种“代际逻辑”^①,孙中山在本世纪初之所想所做,部分是建筑在他的前辈当年所想所做的基础之上。孙中山并非在不成熟的氛围中创造革命(事件)。实际上,在他出生之时(1866),中国已经孕育了革命(进程)。

但在王韬出生之时(1828)却并非如此。每一代都产生自己的新人。但从一代到下一代的更新程度却可能极不相同。人类从得到火车到拥有飞机的时间并不太长,但为了得到火车却费了几千年之久。相对于这个意义而言,由于王韬这一代一只脚还站在革命前的中国,其更新的程度就比孙中山更大。因为王韬这一代,也只有这一代,才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无火车到有火车的巨大跃进。这些也同样适用于王韬和孙中山个人。虽然孙中山代表了革命进程的稍晚阶段,在这种意义上他比王韬要新。但若就他们个人一生所包括的文化变化容量而言,从代际变化的相对观点(而非累积或展望的观点)来看,王韬却比孙中山要新。

^① 这是阿尔伯特·克里格的一段话。见他所著《介绍:日本历史中的个性透视》,载《日本历史中的个性》,克里格与D·H·沙文利编,伯克莱,1970年版,第10页。

的确,展望法到处可用。当我们从孙中山的观点来看王韬,我们的确会应用“有限的”、“并非很先进的”、“仍非常传统的”等词汇。但若我们从他的起始,即他出生时的中国来展望,王韬的创新性就会使我们印象深刻。这两种展望都是合法的,这取决于作者所写的书。本书所论是关于近代中国革命进程的“开端”,即开创阶段。因此本书的中心不在于王韬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革命者,而在于他怎样成为一个开创者。

8 第一章 早年在江苏

1828年11月10日,王韬出生在沿海的江苏省甫里镇,该镇位于苏州东南约50里处。王家在明代颇为兴旺,但当17世纪中叶与南侵的满洲军队激战时,家族成员被大肆杀戮,王家再无往昔的强盛了。待王韬出生时,已岌岌乎濒于破败。王韬的父母所生的前三个儿子,都是在出生后十天之内就患天花夭折。王韬是在他父母专门进香求愿之后,才来到人间的^①。

王韬成年后,仍深深地眷恋儿时情境,只要一有机会,就返乡探访。他最为留恋的是镇边的一座老庙,这里是欢庆新年的各种活动的汇集处。正像王韬晚年回忆的那样,此时这里钟鼓铙钹、唢呐笛声充耳不断;且有无休无止的戏剧和杂耍;在庙门外,卖玩具的小贩把各种玩具摆在两旁,琳琅满目。对甫里的孩子来说,这是最快活的时光^②。

大约3岁时,王韬的母亲就开始对他进行学前教育。她是第9 一个教王韬认字的人,每逢夏夜她总给王韬讲述古代名人的故事和言行,使漫长的夏夜充满温馨。这些故事使王韬深受感动,据王

① 《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16—17页。

② 王韬《漫游随录》,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王锡祺编,台北,1962年版,62卷本,第9806—9807页。